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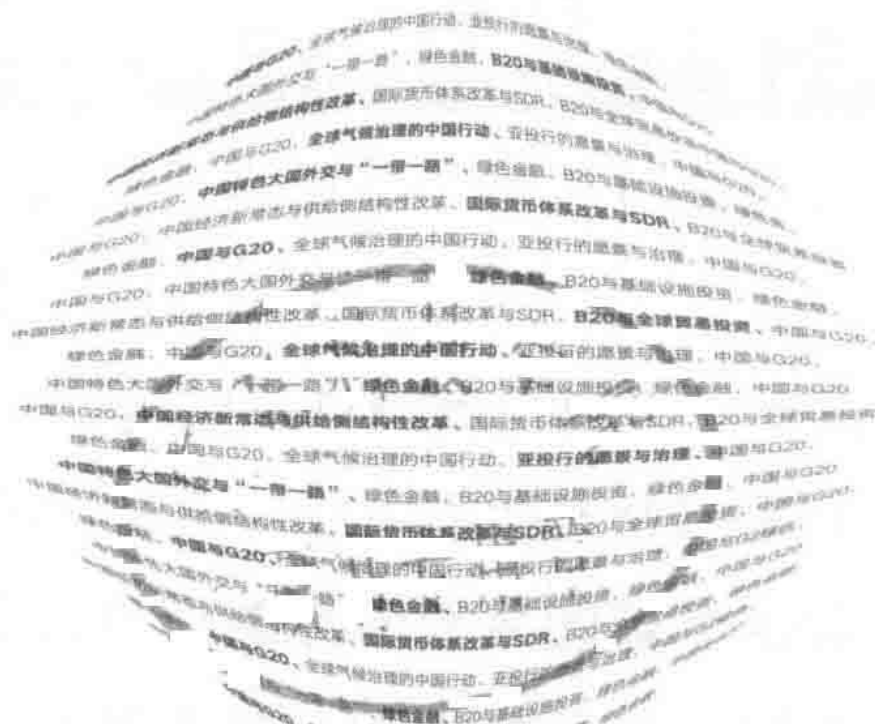
 中国与G20

中国

G20 2016 CHINA

中国与G20

何亚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与 G20 / 何亚非著. —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6
(G20 与中国)

ISBN 978-7-119-10312-9

I. ①中… II. ①何… III. ①国际经济组织 - 国际会议 - 研究
IV. ①F1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9407 号

出版策划: 胡开敏

项目主编: 杨燕青

出版统筹: 于 瑛

项目执行: 熊冰頔

特约编辑: 王 韬 林纯洁 马 鑫 薛凯琳

责任编辑: 熊冰頔

装帧设计: 北京大盟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内文排版: 北京维诺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印刷监制: 冯 浩

中国与 G20

何亚非 著

©2016 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人: 徐 步

出版发行: 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中国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网 址: <http://www.flp.com.cn> 电子邮箱: flp@cipg.org.cn

电 话: 008610-68320579 (总编室)

008610-68327750 (版权部)

008610-68995852 (发行部)

008610-68996064 (编辑部)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 外文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字 数: 8 千

版 次: 2016 年 8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19-10312-9

定 价: 3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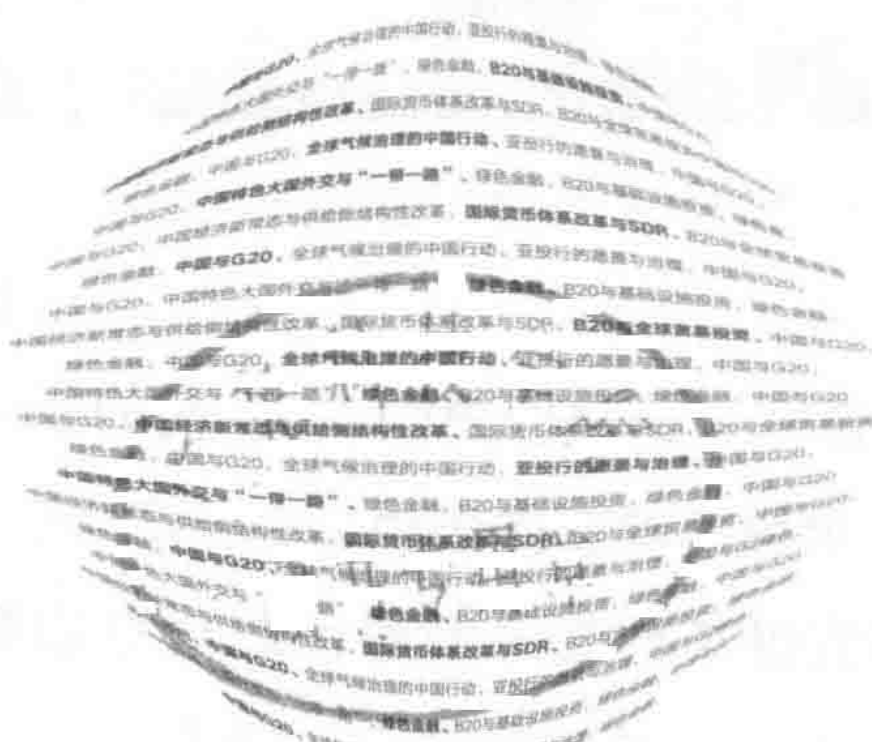


目 录

一、世界为什么需要 G20？ G20 为什么需要中国？	6
二、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是一个曲折过程	10
三、全球经济治理“从量变到质变”	16
四、大国协调是重中之重	20
五、世界期待中国在 G20 展现领导力	24

中国与G20

何亚非



China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0507144 144

144



导言

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把 G20 推上“峰会”级别的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八载春秋，时光荏苒。2016 年中国以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身份主办峰会，世人瞩目。回顾 G20 八年风风雨雨，跌宕起伏，折射出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也是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走向“东西方共治”的历史转折期。其间，G20“摸爬滚打”，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挫折的沮丧，反映出中国与全球治理体系之间的关系变化以及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深层次调整。

中国作为 G20 的核心成员，一直积极深入参与 G20 事务，以中国的智慧和思想，为 G20 的发展以及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做出了实质性重要贡献。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视野对 G20 的发展历程作个历史性、全景式回顾，对我们认识世界格局变化大势，更好设计全球治理的未来结构，不无益处。



目 录

一、世界为什么需要 G20？ G20 为什么需要中国？	6
二、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是一个曲折过程	10
三、全球经济治理“从量变到质变”	16
四、大国协调是重中之重	20
五、世界期待中国在 G20 展现领导力	24

**世界为什么需要 G20？
G20 为什么需要中国？**

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转向“东西方共治”，是新世纪国际体系进入历史性转折期的主要特征，而中国综合实力迅速增强并对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演变产生历史性影响是另一大特征。

2008 年雷曼兄弟公司轰然倒塌并进而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动摇了西方经济治理赖以支撑几十年的基石，美国和西方大国以经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为基本信条的全球治理思想遭受重创。制度和体系改革总是以理论的破旧立新为先导。

在这样的背景下，代表西方全球治理体系及其理论支撑的七国集团（G7）之所以在 2009 年被 G20 取代，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是 G7 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大幅下降，世界力量对比产生“大趋同”，即发达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实力差距大大缩小；另一方面则是西方经济治理理论的破产，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是全球治理体系出现裂缝最有力的历史“注脚”。

我们把历史回放到 2008 年年中，各国当时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巨浪中挣扎，担心世界金融体系行将崩溃，全球经济从此一蹶不振。于是，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大国与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紧急磋商应对之策。西方国家意识到 G7

难以胜任应对金融危机的重任，而联合国又因成员多、协商过程冗长面对危机无法挺身而出。

那么，哪个国际机制既精干高效，又能平衡代表各方力量，且没有西方遭受重创的经济理论包袱呢？世界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 G20 这个 1997—98 年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而设立的磋商机制，当时觉得 G20 作为部长级磋商机制级别不够，就提议将 G20 升格为领导人峰会。

“世界需要 G20”成为大国的共识。

第一次考验是 2008 年 11 月中旬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的 G20 峰会。这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面临严峻考验时第一次正式“亮相”，也是美国和主要西方大国与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开启全球治理最高级别平等对话迈出的“万里长征第一步”。

事实上，在 2008 年 11 月中旬 G20 首次峰会前一个星期，中国率先宣布 4 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随后纷纷出台经济刺激方案和措施。主要经济体以“同舟共济”精神挽救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努力在 G20 华盛顿发峰会上得到集中体现，有力支撑了全球市场信心，遏制了金融危机蔓延。中国就启动 G20 峰会机制并使其有效运转发挥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也由此成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核心角色，与中国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相得益彰，“两个轮子”一起转，奠定了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地位。“G20 需要中国”也成为大国的共识。

G20 自 2009 年匹兹堡峰会确立为“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首要平台”，成为全球性大国共同治理世界经济的全新国际机制。其“新”并非指时间的新，而是有两方面实质性“新意”：

一是 G20 乃西方工业化革命数百年来首个由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等新兴大国平等磋商、共同协调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国际合作机制，而此前数十年一直由 G7 把持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地位。

二是 G20 峰会机制还处在“发育期”和转型期，能否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长期发挥领导和协调作用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随着金融危机阴影逐渐消退，G20 面临从“救火队”向长期治理“指导委员会”的身份转变。而 G20 在塑造全球经济治理新制度的同时，全球性大国和主要经济体的互动也在塑造 G20 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格局，并进而塑造新世界政治、经济秩序。

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是一个曲折过程

全球治理体系的调整与改革并非易事，塑造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更要付出艰辛努力。毕竟改革全球治理体系要重新分配全球化利益，动很多国家的“奶酪”。

毋庸置疑，中国进入新世纪已经成为全球性大国，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关键性作用。观察 G20 的演变过程，中国的发展轨迹清晰可见。

要深入了解 G20 与中国的关系，先要恰当的定义“全球性大国”。全球性大国起码需要具备全球性“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综合实力指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实力，系硬性指标；影响力指在全球治理的地位和影响力，包括议题设置、决策、规则制定和话语权等，是软性指标。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用“系统重要性经济体”来界定“全球性大国”可能更科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定美国、中国、英国、日本和欧元区是“具有系统稳定重要性的国家和地区”。而 G20 包含了上述所有经济体。换言之，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全球性大国的共同参与，否则既无合法性，又无有效性，很难承担全球经济治理和协调宏观经济政策的重任。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凸显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内在缺陷，即治理“赤字”和“碎片化”与经济全球化同步发展的矛盾。其根本原因在于全球治理失衡和反全球化思潮的兴起：

首先，西方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长期保持决策机制、议题设置、规则制定和话语主导的优势，发展中国家则一直处于弱势。虽然近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深刻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但是“大趋同”在全球经济治理主导权上并未出现，而是严重滞后。

其次，全球化迅速发展无疑促进了世界经济大幅度增长，但是全球贫富差距无论在国家之间还是一国内部却都呈现扩大、恶化之势。而且，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恐怖主义等其他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集中爆发，各国因为自身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的错位，使全球性难题拖而不决，甚至愈演愈烈，引发全球范围的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爆发、泛滥，各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分裂加剧。

就全球经济治理决策机制而言，金融危机爆发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占绝对优势地位，G7 统领世界经济的方方面面，其中金融、

贸易投资和发展三大领域分别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世界银行（WB）把持。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都占 16% 左右的份额，一票否决。世界银行行长历来由美国人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始终非欧洲莫属。全球经济治理决策机制不对等、不平等、不合理情况长期存在。

形势比人强。2008 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发达国家遭遇市场和经济的巨大困境，意识到若无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支持，世界金融和经济体系很可能将一蹶不振。G20 首次峰会公报明确表示，要改革国际金融机构，“以适应世界经济的变化和全球化的新挑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包括贫穷国家在内，必须有更大的话语权和代表权”。

次年 G20 匹兹堡峰会进一步作出承诺：“将一部分配额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至少应该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行的配额计算公式从那些过度代表的国家向那些代表性不足的国家转移 5% 的配额。”世界银行将通过动态公式实现公平投票，提高发展中国家最少 3% 投票权。

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份额